第一章　中国古代和近代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是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学科，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它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而发展，对武装斗争起指导作用。

军事思想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概括起来可分为五个研究领域：一是关于战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二是关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的作用；三是关于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四是关于战争谋略和作战方略；五是关于将帅修养、治军练兵的一般原则。

军事思想在军事科学中居首要地位，它不仅是指导军事学术、军事技术、军事运筹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是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武器装备发展、未来战争的指导思想。中国军事思想是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阶级、社会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著述者对于战争和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对中国各个时期的军事实践活动起过宏观和根本的指导作用，为人们认识军事问题，进行军事预测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顾人类已走过的冷兵器、热能兵器、核能兵器，直到现今的高科技武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军事思想反映了不同的军事特征。学习各个时代的军事思想，可从前人观察、分析和解决军事问题的实践和理论中，提高自己学习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寻求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是别具异彩的珍贵遗产，它不仅哺育着无数的精兵良将，而且影响和指导着历代军事活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言兵却不限于兵，而是将军事与政治、经济、人文、自然、心理、艺术等有关因素系于一体，以欲明兵法、先明方略，欲明方略，先明史事的严谨求实态度和极高的军事、哲学修养，运用哲学思维方法观察和解决军事问题，把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运用于军事领域，解释战争运动的条件，揭示战争和战争指导的规律，在战争观、战略观、治军思想、作战方法与谋略等方面，都提出了充满哲理和智慧的真知灼见，从而使中国军事思想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较高的理论概括性和较深远的宏观超前性等鲜明特点。学习古代军事思想要同当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相结合，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时期的军事思想。人类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更替，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及思想意识的转变和战争的日益频繁，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等发展的过程而逐渐深化的。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它可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萌芽于夏商，形成于西周，成熟于春秋，发展于秦汉，兴盛于宋元。

(一)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萌芽与形成时期

中国古代战争始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为争夺生存条件或部族复仇而进行的暴力活动。当时，社会生产不断发展，部落组织日益增多，于是部落联盟的各级军事首领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

不断爆发武力冲突。从炎黄联盟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到舜、禹对三苗进行的战争,不仅具有迫使对方服从自己意志的目的和带残酷的惨烈性,而且有了一些简单的组织形式。但是,战争从起源到结局,并不具有阶级奴役、剥削和掠夺的性质。战争中以生产工具为武器,以角力斗勇决定胜负。因此,战争尚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它在父权制家庭为基础的社会中建立了奴隶的邦国组织。于是,王室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从此,私有制更加发展,阶级逐渐形成,国家已经产生,军队早已建立,战争更加频繁。我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在夏朝国家制度基础上的国家机器不断趋于强化,建立起庞大的军队。由商王和卿士指挥的军队,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为加强王权统治,统治者在思想领域强化宗教观念,把年成好坏、风雨变化、战争胜负奉为神的旨意,使军事活动蒙上了迷信色彩。文字的发明及其运用于文献记录,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中国甲骨文、金文记载着大量的军事和战争情况,留下了宝贵的古代军事和战争实践的原始资料,为了解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积累了素材。尽管只有一些零星的言论和片断的认识,但这足以说明作为认识和研究战争的军事思想已经萌芽。

到西周时期,随着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和战争的发展,新的奴隶主统治者对战争的基本职能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新兴奴隶主为推翻腐朽奴隶主统治的战争实践中,产生了"攻"和"守"、"战术"和"统帅"等军事概念。人们开始探讨军队的多寡、武器的数量与质量同战争胜负的关系,并初步认识到审时而动,量力而行,众可胜寡,强可胜弱的规律。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牧野之战,创造了"以联盟结诸侯",以"用间分裂纣内部"方略的重要战例。周武王在整个伐纣战役过程中,采取恭顺事殷,麻痹商纣,上智为间,分化瓦解,翦商羽翼;笼络人心,争取诸侯,扩大势力;吊民伐罪,严肃军纪,激励斗志;乘虚蹈隙,战车兼袭,以井田阵形的战法得手。这类战争与原始部落时期那种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交战中仅凭勇力角

斗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有了常规军，而且反映了军事思想的《军政》、《军志》等兵书已经问世。《十一家注孙子》和先秦文献《左传》等多处援引了其中的内容。两书通过对战争实践的总结认识到，在战略思想上，只要内部团结、政治巩固、治理得法，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在作战指导上，主张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有胜利把握时就先发制人，敌人强大就避开锋芒，以逸待劳，乘敌疲困饥饿再打；在战场上，军队要进退有据，保持井然有序的队形。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引起了士兵成分的变化和兵器的改进，军事制度和作战方法也随之变化。这些都充分说明在西周时期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已经形成。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成熟时期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是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由于奴隶制国家分封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与争霸的战争和新兴封建势力推翻奴隶主统治的战争，促进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蓬勃发展。各诸侯国为求生存、争霸业、图统一，都致力于增强本国的军事实力，到战国末期，有的国家兵力达百万之众。军队制度管理更为健全，作战方式有新的发展。步兵和骑兵逐渐成为主要兵种，使部队的机动性、灵活性大为增强，从而出现了伏击、奇袭、迂回包围、攻城争夺高地等作战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兵器装备得到了改善，铜兵器质量的提高和弓箭射程的增大，特别是铁制兵器的出现，为各诸侯国扩充军队，改进装备，扩大战争规模提供了物质条件。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的胜负关系到各阶级、各国家、各政治集团的生死存亡。因此，对军事问题的研究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异常活跃。不但军事家谈兵，政治家、外交家以及各种流派的思想家也都研究军事，大量总结战争经验、深刻论证军事学术思想的兵书相继问世，中国军事思想奠基作《孙子兵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

在兵学较为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兵家杂取儒、墨、法、道各家之长，吸取其思维方式中的合理成分，运用哲学思辨方法观察和分析军事问题，他们把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运用于军事领域，在战争观、战略观、治军思想、作战方法和谋略等方面，都提出了充满哲理与智慧的真知灼见。如《孙子兵法》冲破了长期的鬼神论、天命观的束缚，一改“兵者凶器”的观念，强调战争胜利“必取于人”。所归纳的“道、天、地、将、法”战争取胜因素，“智、信、仁、勇、严”的将帅素质指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目标，“先胜后战”的战争原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精妙见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谋略思想，以及对力与智、利与害、全与破、形与势等范畴的深刻分析，虽历经数千载却仍光彩依旧，被称为“具有深刻涵义的哲学”，成为古今中外兵家名将的座右铭。继《孙子兵法》之后，战国时期的兵书中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它们在继承《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广泛地论述了战争观、谋略、战法、阵法，将帅修养和军队组织、训练、纪律、奖惩制度、指挥、侦察、通信等带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内涵。军事学术研究产生的巨大成果，又对战争实践的指导显现出强大的威力。

(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实践中得到发展

秦至五代时期，随着朝代的更替，战争与和平的转换，封建统治阶级在夺取天下、开拓疆土、靖边“戡乱”的时候，重视军事问题的研究，兵家、兵书受到“恩宠”，军事思想出现充实提高的趋势。而当夺取了政权，天下归一，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又担心人民群众一旦被先进军事思想所武装，会推翻他们的统治，因而采取垄断军事，贬斥兵家、诋毁兵书等手段，致使军事思想呈现出缓慢发展的趋势。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介于汉、唐盛世之间，是中国历史上军阀割据的大混战时期，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许多杰出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事人才脱颖而出,涌现了诸葛亮、曹操、孙权、周瑜、司马懿、司马彪等兵家名将;军事学术相对活跃,人们对先秦兵书进行注释,重视战略理论的研究,不断提高军事思想的整体水平。诸葛亮、曹操、司马彪等兵家的军事思想,是这一时期军事思想最高水平的标志。北宋至清中期(公元960—1840年)是中国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皇权对军权的绝对控制,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在军事领域得到全面的贯彻。与此同时,中国封建经济和科学文化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民族矛盾扩大,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外族入侵不断加剧,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种战争频繁发生。物质和文化条件的提高、战争方式的变革、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以及封建主义体制的日趋腐朽等因素引起的矛盾运动,促使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又经历了一个由复兴到最终完善的过程,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古代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是一切军事活动的统帅和灵魂。积极的、进步的军事思想必将引起军事领域的变革与发展,消极的、落后的军事思想则必然扼杀军事领域的一切生机。宋初军事思想的停滞,很快就使北宋统治集团尝到了苦果。宋神宗一即位,便起用改革家王安石全面改革弊政,实行"保甲法"、"置将法",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卒",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经过训练的军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置将规模的扩大和军事训练的加强,就急需要军队人才和军事理论。宋神宗在确立武学和武举的同时,又下令颁发《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作为武学和武举的统一教材,确立了兵书的正统地位。此前的宋仁宗动用国家力量编撰了《武经总要》,还有《十一家注孙子》、《守城录》、《历代兵制》、《何博士备论》等重要兵书,这都激起了人们对军事理论的兴趣。

宋元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除了实际战争的需要之外,军事技术的进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古代发明的指南针,在北宋时就用于舟师导航。大型战船的楼船、车轮船及明代的多桅多帆宝船等

巨舰,能作战于江、海,远航于大洋。郑和下西洋时有舰船200多艘,官兵2.7万多人,说明当时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利用火药制火枪火炮,也使刀光剑影的战场增添了震耳的声音和弥漫的硝烟,使战争的规模更大,杀伤力也更强。与军事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是军队的作战方法和组织编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军事技术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宝库,兵法研究的论述随着雕版印刷的推广和活字印刷的发明以及造纸技术的提高得到广泛的传播,兵书数量日益增多。所有这些都为军事思想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二次繁荣,是宋元明清几代兵学家在继承前人兵学遗产的基础上经艰苦探索,才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它是通过撰著大量兵书,用举事与论理相结合的论兵特点,将贵谋重力的用兵论、戍边守海的国防论和精兵选将的治军论形成综合与类化并存的兵学体系。这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继续得到发展的史实。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并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战争、军队和国防各方面都有深刻的论述。

(一) 关于战争观的论述

这里包括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性质与作用,对待战争的态度,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

荀子对战争的起因解释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①]他认为战争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欲望发展超出了"度量界限"所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韩非子进一步分析了战争产生的阶级根源。他认为,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对立基础之上的,"君上之与民也,

① 《荀子·礼论》

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君主对人民“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①],人民又不会心悦诚服地供统治阶级剥削和役使,在这种矛盾尖锐对立的条件下,随时潜伏着战争的危机。它表明不仅是物质之欲会导致战争,而且阶级剥削和压迫更是战争之源。吴起对引起战争的基本原因进行了系统概括:“凡兵之所起者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②]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学家与思想家,试图从物质原因上去探讨战争的起因,为人们破译战争本质问题打开了突破口。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加,私有制的产生,战争就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态。

战争的性质问题是战争论中的首要问题。春秋时期就使用“有道”与“无道”、“曲”与“直”等概念。《左传》中强调指出,“师直为壮,曲为老”[③],是说军队为正义而战就理直气壮,为非正义而战就理曲气衰。兵家在透视战争两种不同性质的同时,还阐述了区分两种不同性质战争的是非标准。认为正义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④],目的是为了“除暴救弱”、“禁暴除害”,以战争制止战争,而“非争夺也”。相反,非正义战争是“恃国家之大,矜人民之众”而随意发动战争,其目的是为了“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⑤],侵占他国的土地和掠夺他国的财富。这种从战争目的去揭示战争性质,进而透视战争问题的实质观点是非常可贵的。

春秋战国时期,兵家在对战争性质做出区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对战争应持的基本态度。首先是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司马法》曰:“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⑥]还和墨子一样反对“强凌弱,众暴

---

① 《韩非子·六反》
② 《吴子·图国》
③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④⑤ 《尉缭子·武议》
⑥ 《司马法·仁本第一》

寡”的非正义战争。其次是要慎战，反对穷兵黩武。孙子从“安国全军”的目的出发，主张不要轻易起战。他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①]认为国君与将帅必须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准则，慎重地对待战争，绝不能把战争当作侵略扩张、逞威泄愤的工具。

在阶级社会，战争总是同一定阶级的政治紧密相连的。尉缭子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以种子与株苗的关系来比喻武（军事）与文（政治）的关系，生动地揭示了政治是根本，战争从属于政治的科学真理。春秋战国时期对战争本质认识的又一理论成果，是对政治在决定战争胜负作用的认识上。孙武首先提出“道”的概念，说：“道者，令民与上同也。”这里的关键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内外政策，使得君民同心同德。“民心”是胜利的“核心”。管子说：“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计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②]争取“民心”，在于“利民爱民”。孙武向吴王进献时，提出“厚爱于民”，并在兵书中强调“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③]，临战时，必“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这些都反映出古代兵家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本质的认识。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是自古以来兵家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成为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战争的胜利是以它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孙武以“十万之师，出征千里”的战争规模，所耗物资是“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并造成“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④]的间接经济损失。这说明战争领域是最大的消耗领域，所以经济条件是战争物资保障的前提。《尉缭子》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政治上安定团结，纵然“民不发轫，甲不出囊，而威制天下”。《孙膑兵法》中很强调“事备而后

① 《孙子兵法·火攻篇》
② 《管子·霸言》
③ 《孙子兵法·地形篇》
④ 《孙子兵法·用间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动”。他认为,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国富是强兵之本。孙武把经济实力与军备的关系概括为“度、量、数、称、胜”五个字,即根据国土大小、物产多少来确定兵员和物资储备的数量,只有使两者有一个相“称”的比例,才能使战争物资适应实战的需要。春秋时期的管仲也曾较深刻地论述道:“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因此,他明确指出:“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弹;一战之费,累代之攻尽。”兵学家们的这些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形成加强战争储备与发展经济要掌握综合平衡的观念是带真理性的认识。

(二)关于战争方法论的论述

战略问题和战役战术问题统称为“兵法”,这时的“兵法”包含了战略战术的全部内容。战略在“兵法”中占首要地位,战略的核心在于“谋”。孙子用谋的理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谋攻篇》中强调:“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①]孙子以谋胜敌,不战而使敌国敌军屈服的全胜思想,受到其后大多数兵家的推崇,并加以发展,概括为:择机施谋,趁势而入;谋攻要害,瓦解全局;谋攻促变,逐渐演进;多谋共伐,互补促进。孙子认为,要做到以谋取胜,必须谋高于人,能够识敌之谋,以谋攻之,做到兵不血刃,迫敌就范。古兵书中关于作战艺术高超的战例十分生动丰富,有以少胜多的,以弱胜强的,也有反败为胜的。在战术指导上,以“兵无常势”的发展变化观,要求奇正并用,虚实结合,使敌方难以预料。孙子有“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②]。曹操有“出实击

① 《孙子兵法·谋攻篇》
② 《孙子兵法·计篇》

虚，避其所守，击其不意。”李世民和李靖有“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三国时期曹操火烧官渡、周瑜火烧赤壁等都是运用奇正相生的典型战例。古兵法还非常讲究“任势”、“兵无常势”，就是根据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在时机地形等方面创造一种态势和士气，以达到攻必克、守必固的目的。《孙子兵法·势篇》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鸷鸟之疾，至于毁折”，即湍急的流水飞快地奔泻，以致能漂移石头就是“势”；雄鹰迅飞搏击，以致能捕杀鸟兽。淝水之战时谢玄要求秦军后退、顺势追杀取胜即为一例。“诡诈为道”是孙武等古兵学家一种最杰出的战争指导艺术。孙子“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战术原则，列举了十二种战法，亦称“诡道十二法”，是视不同情况的敌情，采取不同的对付办法。孙武对前人作战经验的总结，使后人受到莫大的启迪。晋楚城濮之战，晋军“退避三舍”，后发制人，是体现“强而避之”取胜的生动战例。总之，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关于战略战术的丰富内容，是一座启迪后人的思想宝库，必将在人们开拓战略意识与战术思维中供给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三）关于治军的论述

古兵学家都很重视将领的德才和作用，强调选贤用能。兵法在将帅修养和才智的论述中，有许多章节的专论，最集中的是将德、将才、将威以及将领的智、信、仁、勇、严等品质。孙子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吴子说，“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在乎一人”。诸葛亮、黄石公等主张将领与士卒同甘共苦，戚继光主张将领以身作则，作士卒表率。《六韬》注重选贤任能，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放手使用。与此同时，古代军事家也很重视军队内部关系建设，强调严格训练，严肃纪律，严密管理。自古治军以严为本，有“军中立草为标”，应“令行禁止”，要“有信”和“必诚”。一些军事家反对严刑峻法，主张恩威并用。孙子认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李靖主张“爱设于先，威设于后”。在严格军纪的同时，古兵法还十分

注意平时的作风养成。孙子说,“始如处女,后如脱兔”;吴起说,“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戚继光在这方面更有独特的做法。他在“严号令”、“申军纪”的同时,特别强调养成教育。他规定“各歇家之时”也要“蓄养锐气,修治军装,讲明法令”,并威之以严,疏之以理,培养自动守纪之习。戚继光曾将三千抗倭浙军调天津受训,入城时未接到前进命令,在大雨中从早晨一直站到傍晚,使北方的蒙古贵族受到了震动。

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代表作

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载体——兵书,先后有三千多部问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兵学体系。本书将着重介绍中国古代兵圣孙武的军事巨著《孙子兵法》及其他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

(一)《孙子兵法》

1. 孙子其人

孙武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既有战役、战术的指挥方法,又有对于战争一般规律的深邃见解,充满着辩证法和方法论,达到春秋战国时代军事思想的顶峰。他不仅影响了古代的军事家,而且一直影响到现今;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许多指导作用,为各方面的人们所研读。孙武的军事思想集中反映在《孙子兵法》一书中。

2.《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

《孙子兵法》共十三篇,各篇自成一体,又互相连贯,构成了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

《孙子兵法》十三篇可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由《计》、《作战》、《谋攻》、《形》、《势》和《虚实》组成,侧重论述军事学的基础理论和战略问题。主要强调战略速决和伐谋取胜,以及对战争总体实力计算和威慑力量的深刻认识。第二部分由《军争》、《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组成,侧重论述运动战术、地形与军队配置、

攻防战术和胜败关系。具体包括奇正、虚实、勇怯、专分、强弱、治乱、进退、动静和死生等辩证关系。第三部分由《火攻》和《用间》组成，论述了战争中的两个特殊问题。以下对各篇内容做简要介绍。

(1)《计》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具有提挈全书的作用。本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战争是忧国忧民的大事，就必须慎重地研究。孙武正是从这样的高度来考察战略运筹问题。还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战略基本要素——道、天、地、将、法。指出开战之前，必须将敌我双方这五个要素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取胜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发挥才能。通过谋划施展计谋，即“兵者，诡道也”，作为辅助动作，麻痹敌人。孙武的“诡道十二法”，目的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对敌实行突然袭击。他在讲完了既有客观物质条件的优势，又有主观指导的正确之后，便得出结论：“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2)《作战》篇。本篇主要战略指导思想是速战速决。首先从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依赖关系出发，论述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进而提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以战养战方针。最后以奖励士卒，优待俘虏的“胜敌而益强”的措施，达到实现速胜的战略目标。

(3)《谋攻》篇。本篇主要论述“全胜”的战略思想及其实现的方法和条件。孙武的“全胜”方法之一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即以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再挫败敌人的外交和军队为上策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另一个“全胜”方法是“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孙子说指导战争的法则应是使敌人全国和全军完整地投降是上策，击破它就次一等，不经交战而使敌人屈服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最后提出了欲达“全胜”的重要条件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本篇谋略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4)《形》篇。主要论述在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下，对敌实行进攻所必须具备的军事实力，中心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前要

善于通过匿藏自己的形不被敌方察觉,然后密察敌形,以争取主动战胜敌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自保而全胜也”,从而达到有效利用客观条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5)《势》篇。本篇主要论述将帅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正确变换战术、灵活使用兵力,造成有利态势,以奇正相生战术取胜。孙武非常注意“任势”,提出“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讲的是:高明的指挥官能造成一种像圆石从陡险倾斜的高坡下滚那样,势不可挡。孙子的“奇正”命题,“以正合,以奇胜”,强调正面挡敌,出奇制胜,关键在“奇”。“奇”在变化多端,奇不可测,出敌不意,才能获得制胜效果。

(6)《虚实》篇。本篇主要论述作战指挥中争取主动权的原则和方法。这里的原则就是避实击虚,攻其必救;方法就是隐蔽兵力,集中到主要攻击方向。我“实”的方法:“先处战地”,“不致于人”。“虚”敌的方法:“后处战地”,“致人”,“敌分”。同时还要有巧妙的伪装欺骗的方法,作为争取作战主动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军争》篇。本篇主要论述争取先机之利及特殊情况下的作战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迂直之计”,“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在与敌争利时,指挥官能采用迂回远路示形于敌,用区区小利引诱滞敌,则可从容进军,达到“后人发,先人至”的目的。二是接敌运动时要密切协同,利“四治战法”,抓住战机夺取胜利。“四治”就是:治气、治心、治力、治变。孙武看到了精神因素的好坏、体力的强弱和作战部署的优劣在争取先机之利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8)《九变》篇。本篇论述的九变含义,是指用兵之法在于灵活多变。指出将帅能够精通九种机变之利,就是懂得用兵了。“九变”的内涵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五地,圮地(不可宿)、衢交地(交诸侯)、绝地(不停留)、围地(巧计谋)、死地(要决战);二是知五危:只知死拼会被杀、贪生怕死易被虏、性躁怒防中侮、好名自尊怕受辱、过于爱民引烦劳;三是虑必杂于利害(利中有害、害中有利);

四是“恃吾有以待也”,不要指望敌不攻,自应严阵以待。所有这些都能做到据情应变,即可取得战争的胜利。

(9)《行军》篇。本篇的行军是指如何使用军队,主要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处军、相敌和附众。处军方法有四:“处山之军”,要居高向阳;“处水上之军”,既避背水作战,又应乘敌半数已渡迎击;“处斥泽之军”,在盐碱沼泽地行军,须“亟去无留”;“处平陆之军”,平地作战要选择地势平坦,右翼依托高地。相敌的方法,就战场观察列举了三十二种现象,是要率军的将领须懂“相敌”之法,切忌“无虑而易敌”,否则将“必擒于人”。附众的方法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令素行以教其民”的御兵原则,达到官兵融洽,一致对敌之目的。

(10)《地形》篇。本篇论述的是军事地形学上的问题。通过“地有六形”、“兵有六败”提出战术运用原则,辩证地揭示了敌情与军事地理的关系。“地形者,君之助也”,一要准确地计算地形的险易远近,以便对军队调动、布阵作出选择,将敌情与天时和地利有机结合,做正确判断,以求克敌制胜;二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为民是保,而利合于主”;“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11)《九地》篇。本篇是从战略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九地”在战略进攻中实施突然袭击的若干问题。其法有四:一是“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秘密谋划,诱敌露弱;二是“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察其敌意,猛攻弱项,“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三是“动如脱兔,敌不及拒”;“兵之情主速”,似野兔之迅速,让敌来不及抵抗;四是以优势之兵、迅雷之势、多变之术达到“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毁”的目的。

(12)《火攻》篇。本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目的、条件及其实施方法。“凡火攻有五”,即火攻敌人马、军需、辎重、仓库和粮道,均须有“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所具备的条件和“火发有时,起火有日”的天时气象。实际是以火助攻,来达歼敌目的。本篇还提到

慎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故明军慎之,良将警之”,不要轻易起战。

(13)《用间》篇。本篇主要论述战略侦察,即对敌的军情政情的了解。对用间的重要性和用间的方法,孙武指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知敌之情也”。战争的胜利就在于了解敌方的情况。“五间俱起,莫知其道”,“人君之宝地”,同时使用五种间谍,又能使敌不知我用间之妙,即为国君之宝。“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说明选用的间谍应具有睿智仁义和敏锐的才能,才免于受骗上当,尤其是对敌方的间谍。

(二)《孙膑兵法》

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家孙膑的《孙膑兵法》,是我国古代影响较大的一部兵书,和春秋末期杰出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吴起的《吴子兵法》一样,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很受推崇的军事名著。孙膑,战国齐阿(今山东阳谷)人,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兵法》曾长期失传,《隋书·经籍志》中不见著录。1972 年山东临沂出土汉墓竹简,又重现光华。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孙膑兵法》有 89 篇,图 4 卷,今存上下两编,11 000 余字。《孙膑兵法》不仅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光辉军事思想,而且结合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点:持久战观点和预备队观点。孙膑提出“埤垒广志,严正辑众,辟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是为田忌面临众多凶猛之敌谋划的制胜之策:以增高壁垒,严阵以待,避其锐气,诱敌致疲的持久战打算。这是以弱胜强的基本战略,也是对《孙子兵法》战略思想的补充和发展。孙膑提出“用阵三分”,“斗一守二”和“以一侵攻,以二收”的作战原则,实际是主张作战时,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同敌人交战,三分之二的兵力待机而动,以加强进攻的连续性和防御的稳定性。预备队的观点由孙膑最早提出,这是孙膑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

(三)《武经七书》简介

《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为宋神宗年间校定的一部兵书典集,是由官方颁布的军事教科书。这部书总结了我国古代战争实践经验,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精华,它对后代军事学的发展和战争实践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元丰三年四月神宗下诏颁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目的是为了兴武备、建武学、选武举。颁布武学,是为培养军事人才和武举试士作依据,还设置武经博士,教授《武经七书》。《武径七书》中的《孙子兵法》前面已作介绍,下面简单介绍其余6部兵书。

1.《吴子兵法》

《吴子兵法》是一部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兵家理论著作。作者吴起,战国时期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人,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家、军事指挥家。《吴子兵法》全书约五千字,共分两卷六篇,有日、英、法、俄文译本。主要论点有:对战争实质问题的初步论述,把战争起因归结为:“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和“因饥”等五种;“先和而造大事”与“战胜易,守胜难”的战争观,“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国防观;“料敌”,“应变”,“因形用权”的战略战术原则;“教戒为先”,“以治为先”的建军思想。

2.《司马法》

《司马法》亦称《司马穰苴兵法》,春秋齐国司马穰苴著,共三卷五篇。主要内容有:用“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来揭示战争的本质;“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亡战必危”的战备观;认为“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

3.《尉缭子》

相传为战国时尉缭所撰,全书共分五卷二十四篇,约九千余字。尉缭的生卒年代及生平事迹无文献记载。全书的主要内容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